

【书林清话文库】

邃谷书缘

来新夏



河北教育出版社

【书林清话文库】

主编 傅璇琮 徐雁

邃谷書緣

来新夏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邃谷书缘/来新夏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5

(书林清话文库/傅璇琮, 徐雁主编)

ISBN 7-5434-5787-3

I. 邃… II. 来… III. 读书笔记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895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787-3/G·375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邮购电话: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从《学林漫录》丛刊 到《书林清话文库》

(代 序)

傅璇琮

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求学，至1952年8月，随我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后毕业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本以为就此可以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坦途上前进，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谓的“同人刊物”问题，与乐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开诚等人一起被诬为“右派集团”而身心俱受打击。

195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被贬逐至商务印书馆。我在北大是教书，只不过三四年，而且那时只是个助教，跑腿儿的机会多，真正上堂讲课不过少数几次；到出版社是编书，倒是每天与书打交道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除外），编书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但现在稍稍作一些回顾，编出的书真能惬意的，却也似乎不多。能说得过去的，我觉得只有《学林漫录》丛刊那一种。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自我感觉似乎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在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帮手，也或许看到我刚从大学出来，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件事。

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越缦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遗漏的部分。李慈铭也可以算是我的乡先辈，大学念书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

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了，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虽然头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时对脑子里的“东西”却似乎还拘查得不严。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儿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长，1958年7月，由于几个老牌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确定，我又被调转至中华书局。随即转入纷繁的编书生涯，“商务”那段短暂而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从此，“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

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告诫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是懂得爱惜专业人才的，并不让我去“下放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书稿中，专致于编辑业务。我为审读有关书稿，就上自《诗经》下至《人境庐集外诗》地翻阅了不少书。我在《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的序中有过回忆：

按照我当时的政治处境，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我白天审读、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书。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提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

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天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点。我没有荒废时间。

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应当说，中华书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学问的底子。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初版，2003年5月重印）的“重印题记”中说过：“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时间读书作文。”

不过，头几年的事务也确实丛杂得够呛。

刚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对今天的读者毒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来加以“消毒”。新编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既然反旧编之道而行之，旧编“美化封建”，我们现在就要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间作品为主，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以及民歌民谣优先选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鹤等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编辑室内屡次为某些作品入选与否争来争去，编辑室一位副主任，可称“三八式”干部，后来总结这次新编的工作，认为自始至终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无疑是把我和其他几位列入错误路线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邓拓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请邓拓当顾问，这本“新编”的前言即出于邓拓之手。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时，把《新编唐诗三百首》也揭发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还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静寂时，读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揭发批判文章，真是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明明白白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只不过选成后邓拓看看，怎么忽而变成是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了！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个农家的昏微灯光下，面对着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新编唐诗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间结束，随即转入杂务。记得我刚进中华书局时，一位编辑室主任曾给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写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枢垣初刻》，叫我写一篇“出版说明”；后来还经手过顾颉刚先

生标点的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第三部是《顾亭林诗文集》，除了通阅、标点外，还要各写数千字的有评析的说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间文教战线“拔白旗、插红旗”，北大中文系师生编了一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编辑室领导又命我做该书的责任编辑。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这样的一种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锻炼”，但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我在理智上觉得应当把它做好。

而对于《学林漫录》，则完全是出于一种趣味上的爱好。1979年至1980年间，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交友面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一样，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编者的话”所说的缘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仍用“编者的话”说便是：

《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不是很经心了。这是不是谦词呢？不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心

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脚，恐怕是合适的。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启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启功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有建树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这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

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近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子，不作姿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问世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代史编辑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史编辑室的许逸民两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请的写作者一般都是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日久，了解自深，行文又自然、真挚，读来使人倍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前后所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位人物。

《学林漫录》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两三千字，是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阅读负担。有的还仅数百字，如俞平伯先生的《德译本〈浮生六记〉序》（第八集）和钱仲联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记》（第十二集）。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后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两篇都用文言写：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一如晚明风格；钱先生的记则奥义丽辞，直追六朝译经。

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文章，一是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开拓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为由向张、许两位推荐，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的旧作，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介绍，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读〈学林漫录〉》，见《书品》1987 年第四期）。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学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请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遽常、任继愈等，这也是别具一格之处。封面设计也是一贯的素雅沉静的风格。

自从 1980 年 6 月出版《学林漫录》初集以后，就进度和印数来说，可以说每况愈下，特别是在 1988 年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 1980 年出，印了三万多册；第二、三、四集是 1981 年出，第五、六集是 1982 年出，第七、八集是 1983 年出，第九集是 1984 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数千册。1985 年倒也出了两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 1985 年以后，1986、1987 两年都是空档，1988 年 1 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两千五百册。

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的出来否？有的开玩笑地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

结果第十三集于 1991 年 5 月出版，印一千册；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册。后来又把它们集合起来，换了封面重印过一次。中华书局拟陆续新

编，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编辑新集了。

在编辑《学林漫录》的过程中，我对于那些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就十分有兴趣，先后主张刊登过《傻公子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许寅）和《书林琐记》（雷梦水）等，但毕竟侧重点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编纂《中国藏书通史》问世以后，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曾经有过多次学术合作的徐雁教授谈及，在此领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筹划一套《书林清话文库》，大可裨补学坛，沾溉书林。我以为文库的立意颇佳，有关各书的选题，如韦力先生的《书楼寻踪》、曹培根先生的《书乡漫录》、孟昭晋先生的《书目与书评》、刘尚恒先生的《二馥斋说书》、谢灼华先生的《蓝村读书录》、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以及来新夏先生的《邃谷书缘》、徐雁先生的《苍茫书城》、虎闾先生的《旧书鬼闲话》、林公武先生的《夜趣斋读书录》、胡应麟等的《旧书业的郁闷》、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续编》，都极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眇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文选》卷二十三）；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书林清话文库》即将付梓，按例不能无序，但又苦于事冗少闲，商诸徐雁君，徐君囑以缀合旧文以为“代序”之法。四五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著述的两种书，如今又将印行本套文库，可见其赞襄学术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我谨致以谢忱。

2004年10月于北京西城六里桥寓舍

书 缘(代序)

活了八十多岁，回头一看，只干了一件正经八百的事，那就是与书结了一辈子缘。无论藏书、读书、写书，还是认识读书人，都没有离开过书。这是一种缘分——书缘。

我从呱呱坠地就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听母亲后来说起，抓周那天，在抓周盘中放了诸如笔墨、糖果、小玩意儿、制钱、小元宝、香烟中的美女毛片等等，祖父又特意拿了非常精巧的一小函科举时代考场应急用书放在抓周盘里，用来预测我未来的志向。据说我毫不犹豫地拿起那本小书往嘴里送。祖父掀髯大笑，连说好！好！而祖母则嘟嘟囔囔地说，又来个书呆子。天意如此，与书为缘的一生，似乎早已命定。

我五六岁时就从祖父读蒙学书，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平日和我在一起时，很慈祥，怎么捣乱他都能容忍；但一旦读书，却很严厉。他教我

读三、百、千、千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也常讲一些历史故事如“梦笔生花”、“康梁变法”等等。他主张书要背，有时提醒两次，我还不能流畅地背，就点枝香，罚跪在垫子上背，直到香点完背得滚瓜烂熟为止。这对我一生读书铺了一个很好的底。七岁那年，我随父母到天津读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但是，祖父并不放松我的国学基本教育。他指令我父亲教我循序渐进地选读《论》、《孟》。从我十岁以后，祖父从《古文观止》中精选了若干篇，一篇篇亲手钞寄来让我背诵，像《郑伯克段于鄆》、《蹇叔哭师》、《李斯谏逐客书》、《报任安书》、《陈情表》、《兰亭集序》、《桃花源记》、《吊古战场文》、《阿房宫赋》、《进学解》、《捕蛇者说》、《醉翁亭记》、《卖柑者言》等等，至今我对这些名篇还能约略记得。后来又选钞了一些唐诗宋词。我把祖父的手抄本

分订成两册，一直保存着，随时诵读，对我日后写文章甚有裨益，可惜在“文革”时，遭到了丙丁之祸。

我喜欢读书，但读书也曾给我带来过苦恼和无奈。就在我十四岁（1936年）那年，正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初一的时候，父亲因调职，携母亲与二弟离开南京。我因不便中途转学，就开始过寄宿生生活。由于无人管束，任性而为，经常挟中外小说数种，拎水壶及面包零食一小袋，去玄武湖租船，自由飘荡一日，卧读小说，或凝望蓝天，品味情节；或闭目沉思，与书中人物同行，彼喜我喜，彼悲我悲，殆若痴迷。不意学年终结，因旷课过多，又有几门课程不及格，得“留级”处分。自感愧怍，悄然离校，只身北归。父母虽未严责，但冷遇不交谈者逾月。后在天津重读初一，力求奋进，成绩飙升，直到大学毕业，始终在前三名。这也算是读书生活中的一次波澜。

我十七岁读高中，开始读史书。在两年内细读了前四史，以后又陆续从家富藏书的语文老师谢国捷先生处，借读了其他诸史的纪传和部分志。同时开始搜集史书中资料，撰写《汉唐改元释例》。二年以后，我完成了初稿。这是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以后我又以读书为题写作了若干学术随笔，奠定了我80年代大写随笔的初基。

1942年我二十岁，考入北平辅仁

大学。读书环境大为改变，既有陈垣、余嘉锡等名师的指导，又有大量庋藏的图籍，眼界为之大开，如入宝山，目不暇给。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贪婪地读了各种各样的书，自己也觉得颇有点“腹笥”了。慢慢地产生要藏书的欲望，于是在家中原有的线装书基础上逛旧书店、书摊，访书购书，买了《日知录笺释》、《廿二史劄记》、《近代诗钞》、《上海掌故丛书》、《二十四史》等近千册图书。其中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件是进大学第一年，选修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课。余先生指定课本是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跑遍京城旧书店、书摊，没有找到。后来终于在天津天祥市场找到，如获至宝，不仅解决了学习用书，而且还与这部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我一生的案头用书，日后又为我完成《书目答问汇补》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第二件事是我在某家旧书店买了一部手写《板桥诗集》，价钱很便宜，我自鸣得意，以为淘到了镇斋之宝，经常向人显示。后来遇到一位行家，告诉我这部书不是手稿，而是从刊本板桥手迹中影写下来的。这对我不啻当头一棒，从此启示我更多地学习版本知识。前者“文革”时抄家抄走，后来在发还查抄物资时，幸运地从一捆乱书中找到，虽封面有些破损，但我汇补的资料完整无缺，只不过把我汇补者的名字涂掉，似乎认为我不配而已。后者则被“红卫兵”以

“扫四旧”为名,和其他线装书一同付之一炬了

读了一些书,就渐渐产生一种想写作的冲动。我从十七岁开始,在谢国捷老师指导下学写文章,有的经过谢老师的首肯,还投寄报刊发表。不久,我就开始写我一生中第一篇专题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后来带到大学,经陈垣老师具体指导,改成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从此,我的读书、写书生涯,一直不停,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我也没有放下这枝笔。因为我和书的缘分越来越深,就像蚕吃了桑叶必然要吐丝那样,直到目前我已完成专著性著作近三十种,为学术界所熟知的有:《林则徐年谱初编》、《古典目录学》、《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北洋军阀史》、《古籍整理讲义》、《三学集》及《遼谷文录》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已迈入老年,有许多人生阅历想抒发,也想把自己从民众中得来的知识回归民众,而当时大环境也日益宽松,于是我开始“衰年变法”,写了较多随笔性的文

字,至今已先后编成十几种随笔集,如《冷眼热心》、《枫林唱晚》、《一苇争流》、《且去填词》、《学不厌集》、《出柘集》、《只眼看人》及《来新夏书话》等十余种。但我还没有时人所谓的“挂笔”、“封笔”之想,而仍然感到意犹未尽。看来我和书的缘分,要到地老天荒才算个了。“春蚕到死丝方尽”是我与书结缘以来的终生职志!

傅璇琮和徐雁两位先生主编一套《书林清话丛书》邀我加盟,我感谢他们的盛情,就把近几年读书、写书的愚者一得编成一集,分为三卷:卷一是读一般书所写书序、书评以及一些感受;卷二是由于近年关心新编志书较多,也写了不少有关方志的序评,以其尚少人注意,特独立一卷;卷三是写一些读书人与书的逸闻轶事,为书林增掌故,益见闻。书编成之后,因其所记,均与书有缘,而大都成篇于“遼谷”,乃名之曰《遼谷书缘》。

是为之序。

2005年初春写于南开大学遼谷

目 录

书缘(代序)	1
--------------	---

读 书

《汉唐改元释例》的序及其他	1
我的书斋遼谷楼	4
《三学集》自序	8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补正》小序	14
五十年成一书	16
我与《书目答问》及汇补	26
《清人笔记随录》书感	31
旧貌新颜传书香	33
《萧山古迹钩沉》序	36
《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序言	38
《中国文化世家丛书》序言	41
《天津建卫 600 周年》丛书序言	43
流入学的脚步	47
重读《耕堂读书记》	50
一部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字狱的专著	53
一部值得一读的通俗史书	57
留取丹心照汗青	60
《中国藏书通史》读后	64
《中国藏书楼》读后	66
读徐宗文著《三余论草》	69
藏书·读书·治学	72
藏书文化交谈录	78

答“缘为书来”网友问	83
我的线装书	88
京华杂钞	91
逛旧书店	94
一件值得回忆的往事	97
复作家韩小蕙女士的信	102

读 志

新世纪的修志思考	105
自著方志学著作提要	110
《地方志编纂与续修》序	117
题《滨久文集》	119
《西樵志语》序	121
《拾秋集》序	123
《夏津旧县志校注》序言	125
《天津·和平区志》序	127
读《临汾市志》	129
浅评《商丘地区志》(续卷)	132
评《杨柳青镇志》	135
漫评《唐山市志》	138
《晋城市志》读后	141
评《理家庄村志》	143
评说《铜仁市志》	145

读 人

顾炎武与徐乾学	149
王士禛和他的随笔	152
高士奇和他的笔记	161
王鸣盛的退休生活	170
清代笔记作家梁章钜	174
李慈铭和他的游记	182
严复: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人物	184
通俗史学家蔡东藩	190

拜访徐志摩故居	196
一代学人傅斯年	198
顾老为我写书序	201
忆念吴廷璆先生	204
送志玖教授	207
斋藤,走好!	210
为日本友人大庭修教授写《自用印集》序 ...	212
牧惠是幸福的	214

读书

《汉唐改元释例》的序及其他

《汉唐改元释例》一文撰于1946年,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它是我在研读援庵师释例诸作后所选的课题。因汉唐改元之举颇具典型,乃以汉唐二代为主,仿释例之体,撰成此篇。其间援庵师多有指导。毕业前夕,援庵师以指导教师身份口试时曾以“颇有作意”相勸。距今四十五年,犹恍如昨日。60年代后期,书稿虽经劫难,而此文草稿幸存。现缮录清本,内容一仍其旧,文字订正讹訛。谨以习作,呈献于援庵师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缅怀师恩,略表寸忱,固不计其幼稚粗陋矣。

1991年2月识于遼谷

《汉唐改元释例》目录

序

凡例

绪论



《汉唐改元释例》首次刊发于
援庵师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章 得国改元例

易朝改元例

继位改元例

传位改元例

僭位改元例

反正改元例

第二章 废立改元例